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系列

■ 黄益平等/著

超越奇迹： 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

Beyond the Miracle:
Chinese Reform in a Changing Worl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超越奇迹： 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

Beyond the Miracle:
Chinese Reform in a Changing World

■ 黄益平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黄益平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978-7-301-20087-2

I. ①超… II. ①黄… III. ①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管理-文集 ②国际金融-文集 IV. ①F123.16-53 ②F8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684 号

书 名: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

著作责任者:黄益平 等著

责任编辑:朱启兵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087-2/F·303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em@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6.75 印张 436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定 价: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总 序

自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



论、制定政策、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是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2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余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六位增加到现在的近三十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十余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一线做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许许多多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

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简报和论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4年开始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丛书。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界人士汇报中心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此系列第1辑共13本著作已于2004年出版,此次出版的第2辑将会收录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最新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以飨读者。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十余年只是一瞬;就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会秉持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

2007年7月

目录

引言:奇迹之后的改革与发展

黄益平 彭 旭 \ 1

第一部分

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转型

1. 解剖中国经济之谜

黄益平 \ 17

2. 要素市场扭曲与外部经济失衡

黄益平 陶坤玉 \ 33

3. 经济结构调整难在何处

黄益平 王碧珺 \ 51

4. 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

黄益平 王 勋 \ 66

5. 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黄益平 蒋庭松 \ 95

6. 中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黄益平 王 勋 华秀萍 \ 115

第二部分

汇率政策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

7. 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中国货币体系与经济绩效

——从大萧条到大衰退

黄益平 林 念 王 勋 王碧珺 \ 139

8.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和国民福利影响分析

黄益平 陶坤玉 \ 159

9. 为什么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缓慢

——剩余劳动力与 BS 效应

党伟华 黄益平 \ 193

10. 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分析

黄益平 王 勋 \ 216

11. 短期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管制有效性分析

苟 琴 王戴黎 黄益平 \ 251

12. 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时机与进程

黄益平 谢沛初 \ 289

13. 是否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模式”

王碧珩 黄益平 \ 299

第三部分

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改革

14. 中国能否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

黄益平 \ 325

15. 亚洲汇率波动及政策挑战

黄益平 \ 345

16. 区域内国家间储备货币互持

——降低亚洲各国外汇储备风险的一个建议

樊 纲 王碧珩 黄益平 \ 360

17. 国际货币改革与亚洲货币合作

陶坤玉 黄益平 \ 382

18. 国际经济秩序改革

——中国想要什么

黄益平 党伟华 王 姣 \ 401

后记

黄益平 \ 417

引言：奇迹之后的改革与发展

黄益平 彭 旭

本书大概共二十篇论文，涉及的话题比较广泛，但所有这些分析都紧紧围绕一个问题：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经济如何改革与发展？中国在过去改革三十年间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奇迹不可能长期持续，而且当前暴露出来的一些风险也表明我们应该尽快告别奇迹，走上常规发展的道路。但应该如何告别奇迹？相关经济政策还在探索过程中。本书的一个核心框架就是通过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来理解经济奇迹的创造、经济风险的积累以及未来走向常规发展的关键。

经济奇迹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政府的财力，更是把中国从一个小国经济改造成了一个大国经济，而且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但其目前的权利和责任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仍然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告别经济奇迹之际需要补的一堂课。而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就必须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在经济决策领域抛弃小国心态，争取大国经济的权利，承担大国经济的责任。

因此，我们所说的“超越奇迹”，并非指经济要加速增长。其实经济奇迹只是成功地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才是更大的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推进以生产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让增长速度慢一些、质量高一些、结构平衡一些。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增长，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才有可能再次成为引领世界经济风骚的大国。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强国，正是我们对奇迹之后的中国经济的最高期待。



一、中国经济面临新的转型

中国政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决定开始经济改革,在随后的三十年间,其宏观经济表现十分惊人:GDP 平均增长率接近 10%,而 CPI 的平均年率则保持在 3% 左右。中国从一个几乎奄奄一息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一跃成为全球最为强劲的新兴市场经济,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已经逼近 5 000 美元。在 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包括美国的消费者、澳大利亚的农场主、欧洲的品牌生产商和南美的矿工等,无不受到中国经济变化的影响。中国在改革期间的经济成就经常被称为“中国奇迹”,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促成这个经济奇迹的因素与机制。

不过,所谓“奇迹”通常是指在正常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情形。既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表现是一个“奇迹”,那么这种表现也就不可能是常态。因此由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其实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况且除了超常规的经济表现不可能永远持续以外,伴随我国经济奇迹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不协调的、不平衡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外部经济失衡、资源消耗过多、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制定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如果这个转型不成功,不仅奇迹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地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个未知数。

但过去几年政府仍然在全力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即使在全球危机期间,我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不遗余力地保增长。问题是增长虽然保住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却没有取得显著进展,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反而变得更为突出。比如,投资占 GDP 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38% 上升到 2010 年的 48% 以上,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也从 2003 年的不到 3% 增加到 2007 年的 10.8%,在随后几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比例稳步下降,但仍然一直保持在 5% 以上。“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关于结构调整的四个指导性指标,除了能耗比之外几乎都落了空。“十二五”规划期间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有待观察。

要判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我们需要首先清楚地认识如

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奇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第二，近期增长模式风险上升的原因何在？第三，为什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一再落空？

过去两年我们所做的一大部分研究工作就是试图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我们发现贯穿对这三个问题回答的主线就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生产要素成本的低估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促成我国经济成功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这一因素已经成为结构失衡和效率低下的原因，而政府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没有见效，主要就在于这些政策没有致力于改变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而我们在过去几年所做的研究的主要发现或者结论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我国经济在改革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但创造经济奇迹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市场化这样一个概念所能概括的。我国的经济改革实际走的是“非对称市场化”的道路，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上被完全放开了，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依然十分普遍与严重，比如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隔、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国家对资金分配的干预以及政府参与资源定价等。而这些要素市场的扭曲，并非单纯的改革尚不彻底，它们实际上是改革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奇迹的重要贡献因素。

比如，我国经济目前仍然呈现普遍而典型的金融抑制的特征，包括利率管制、汇率干预、政府对贷款决策的影响、频繁调整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和资本管制。按照传统的金融抑制理论，这样的政策降低效率，增加风险，从而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这样的金融约束或者谨慎改革策略其实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而促成这个结果的是三个重要的机制：一是政府通过管制利率、汇率压低了生产、投资的成本，增强了经济活动的激励，假如没有利率、土地和税收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我国在改革初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二是政府既有强大的组织又有明确的追求增长的政策目标，因此能够相对有效地配置资源，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重点经济部门；三是保障了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可以想像，如果我国从一开始就彻底地放开了金融部门，不但金融中介难以有效运转，而且可能已经经历过多次的金融危机。

其次，要素市场扭曲可能也是我国过去十年来增长模式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从资金到能源等要素的价格被普遍压低，不可避免地降低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最为突出的是近期我国经济快速重工业化和大宗商品消耗

大幅增加,严重偏离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些扭曲实际上也相当于为企业
提供变相的补贴,这样的政策人为地提高了生产的利润率,增加了投资的
回报,改善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投资、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
直线上升。而利润暴涨的同时,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严重
影响了消费的增长,进一步制约了调整内外部经济失衡的能力。投资过
度、消费不足、经常项目顺差过大、资源消耗过多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其实都与要素市场扭曲紧密相关。

如果说在改革前期政府干预能够帮助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随着
市场的发展,政府失灵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明显
偏好国有部门、歧视民营经济,这显然会降低资金的利用效率。有的专家
甚至认为,如果政府与国有企业结盟,有可能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甚至走
向国家资本主义。比如,以前金融约束有利于我国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而现在却变成了金融风险的源头,我们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目前金融约束或
者金融抑制已经成为压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最后,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至今尚未取得显著的成功,归根
到底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没有真正涉及政府与经济部门的激励
机制。对政府来说,GDP 增长至上的目标还没有得到改变,其根本原因是
因为经济增长决定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机会。因此,尽管政府一直强调宏
观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保增长、反通胀和调结构,而且决策者多次把调结
构提到关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高度,但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存在
一个三元悖论,也就是说三大目标一般不可能同时实现,如果要牺牲一个
目标,调结构肯定是首选。因此,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不改变,经济模式转
型就难。

而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调结构主要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短期
有些效果,但长期不可能有效。只要资金价格低、投资回报高,政府就不
可能控制住投资过度的问题。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之道就是要推进要素
市场的改革,消除生产成本的扭曲,从而改变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的决
策和行为,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分配效率,改变国民收入在政府、企
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逐步平衡经济结构。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关
键就在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激励机制能否改变。而政府激励机制的
改革需要改变目前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甚至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
改革。而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经济变化为这个转型提供了可能性,比如

劳动工资大幅度上升,尽管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收入分配、刺激了消费、促进了生产企业升级换代,并将推动地区经济更加平衡地发展。政府已经开始逐步调整资源价格,而且准备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制度改革。

只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才能保障可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过渡。中国经济将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也许会有所放慢,但经济结构会更加平衡,增长质量会更高也更加能够持续。

与上述转型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大国,这对于我国的经济政策选择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更多的权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担更大的责任。实际上,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已经成功地由原来的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国经济并非以国土范围或者人口规模为依据,而是看一个国家的供求变化对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影响力。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而且也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其实就是中国已经成为大国经济的最直接的证据。与之俱来的,是大国经济的责任与国际社会对大国经济的新的预期。原有的一些经济政策扭曲可能就难以持续,比如币值低估,小国经济时很少有人注意,变成大国经济之后却可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性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作为 G20 的一个成员,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控制全球金融危机和支持世界经济复苏的政策协调。中国在 IMF 也逐步被赋予更大的发言权和责任,2011 年 7 月朱民被任命为 IMF 副总裁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关键一步。部分学者甚至提出由美国和中国一起组成 G2,共同治理全球事务。但这些预期与中国的心理、实力和制度准备之间尚存在巨大落差,因此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实现。不过中国的全球性角色发生变化这一点并无多少悬念,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变化以国际社会和中国都能接受的方式和速度推进。这也是我国在经济奇迹之后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消除要素价格扭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奇迹与结构失衡同时并存,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期间的独特现

象。过去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包括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关于发展战略的理论,诺顿和樊纲关于双轨改革的假说以及赛克斯和胡永泰关于重复东亚市场经济的猜想,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理由,但没有同时揭示经济风险上升的原因。而这正是我们研究小组在过去两年中着重分析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以非对称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扭曲,来解释我国在改革期间经济奇迹与结构失衡同时并存的现象。

过去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一点看起来比较奇怪,因为温家宝总理自 2003 年就职以来一直在努力消除经济结构失衡,提高经济效率,但这些政策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相反经济矛盾却变得日益突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政府希望控制投资过度的问题,但投资占 GDP 的比例反而上升了十多个百分点;政府希望消除外部账户失衡,但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反而从 2003 年的低于 3% 提高到 2007 年的 10.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 2009—2010 年,顺差仍然超过 GDP 的 5%。

因此,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支持增长的能力这么强,但对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却束手无策? 我们所提出的解释的核心是激励机制,换句话说,经济主体如何行为,主要不是由政策语言决定的,而是受激励机制驱动。我们可以从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互为联系的层面来说明我们的解释。

中国的政府行为与典型市场经济的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情况下,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品,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而在我国,政府往往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一些经济学家把我国政府称为生产型或者发展型政府,各地的省长、市长的主要工作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与其说是地方政府长官,他们其实更像是公司的 CEO。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曾经有过两个著名论断,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两句话给地方政府官员的直接含义就是,只有“发展”才能保住职务,才有可能升迁。后来李洪彬和周黎安等用比较严格的统计分析证明了这个直观的解读:GDP 的增长速度是决定一个省长、省委书记能否得到升迁的最主要的因素。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政府官员拼死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了。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四大对象：增长、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通常政府将增长与就业合二为一，通俗地讲也就有了三大目标，即保增长、反通胀和调结构。但问题是这三大目标通常不能同时实现，因而有时被称作中国宏观经济的三元悖论。而一旦三者之间发生矛盾，决策者显然不愿意放弃增长和反通胀的目标，因为放弃这两者，不仅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也可能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升迁机会。当然放弃调结构的目标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但这个问题不会马上爆发出来，因此不至于影响官员的升迁。

企业也同样受激励机制的驱动促成结构失衡。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我国改革政策最为成功之处在于重新引入了自由市场机制。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我国改革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国的市场化是不彻底甚至不对称的。简单地说，过去三十年，我国的产品市场基本上全部被放开了，但要素市场扭曲依然十分普遍而且严重：从劳动力市场的户口制度，到资本市场的利率管制和汇率低估，再到政府对资源价格直接、间接的干预。这些扭曲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压低了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因此它们类似于向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提供变相的补贴，使得这些经济主体的活动异常活跃，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造成了结构失衡。

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调结构的努力见效甚微，比如政府一直主要依靠国家发改委控制过度投资的问题。发改委的主要手段是调节新开工项目的审批速度，警告可能出现过剩生产能力的领域，甚至直接关停不合规的在建项目。但问题是，尽管行政控制短期内可以见到一些效果，但这些效果往往很难持续。如果资金成本太低，投资有回报，发改委很难有效控制投资规模。况且过去的经验也多次证明发改委官员对过剩生产能力的判断存在偏差。

我们这个解释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楚，即要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必须从改变激励机制入手。在政府层面，必须放弃GDP至上的政策导向；而在企业层面，就必须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前者实施起来难度很大，而后者则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资源价格已经开始得到调整，劳动工资已经迅速上升，而金融抑制则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明显减少。比如，劳动力市场接近刘易斯拐点，由原来的劳动力过剩逐步过渡到劳动力短缺，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结构性改善，包括刺激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和平衡地区发展。

如果我们稳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步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就有可能

让我国经济由原来的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而这里所说的常规发展,起码拥有如下一些特点: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适当慢一些,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有所提高,收入分配会变得相对平等,产业升级换代会明显加速,而经济周期则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转型成功,这样的增长模式应该更可持续。

进入常规发展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第一,GDP增长速度可能会从过去三十年的10%回落到8%甚至更低一些,当然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全球来看依然是十分强劲的;第二,随着要素价格全面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有所抬头,过去三十年CPI年率平均不到3%,今后十年也许会提高到5%—6%的水平;第三,过去我国经济一直主要依赖低成本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保持竞争力,未来则必须转向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因此产业升级换代的速度将大大加快;第四,过去个人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现象将可能发生逆转;第五,过去由于政府强力支持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不太明显,但以后波动的幅度可能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把计划年代的模式看做是“无市场经济”,那么过去三十年所走的基本上是“半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实现“全市场经济”。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实现这最后一步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当然,要成功实现转型尤其是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仅仅放开要素市场可能还不够,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改革来配合,比如增强创新能力、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和改革政治体制等等。

三、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过去十年来,人民币汇率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的主要经济伙伴都十分关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而一些多边国际经济论坛,如G20和IMF的会议也经常讨论这个话题。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一客观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汇率扭曲的国家非常多,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可能也不是最严重的,但很少有人特别关注那些国家的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与其他货币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已经是个大国经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影响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要理解汇率政策改革的难点,也必须把它放到要素市场扭曲这一宏观

经济框架里面来考察。说穿了,与利率低估和能源价格低估一样,货币低估也是我国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措施。我国的经济决策者一再强调人民币汇率不应该大幅升值,主要是为了不严重影响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这等于从反面证明了汇率政策在保增长的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性。

其实在计划经济年代,人民币币值是被严重高估的,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1.5。这与当时由进口需求决定出口盘子的做法直接相关,贸易的主要目的就是进口大型机器设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高估的人民币其实有利于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但这样的汇率体制十分不利于出口,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人民币一直持续贬值。1994年年初官方、市场双轨合并,新的汇率为8.7,并由此建立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尽管汇率制度安排在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一些反复,但总体上人民币一直保持缓慢升值的趋势。

但政府对于升值的谨慎,尤其是对于大幅升值后果的担忧是有目共睹的。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明确提出促进出口增长、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目标,使得我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96年的24%上升到2007年的37%,而外汇储备则从1996年的1600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年初的3万亿美元。这说明当时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但我国自2001年年底加入WTO以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便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的经常顺差和外汇储备双双飙升,主要经济伙伴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但实际上国际压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汇率扭曲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实际上十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贸易争端变得日益频繁,一个发展中国家持有大量的低回报的美国国债,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大量的经济资源被廉价地集中到出口部门,不但变相地补贴其他国家的消费者,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国内非贸易部门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

其实我国政府从2005年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调整汇率政策,2006年宣布的“十一五”规划甚至提出要在五年内平衡国际收支。不过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导,汇率政策上的谨慎态度依然十分明显。2005年以来的主流观点是让货币缓步升值,其实在相当长时期我们也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实体经济的调整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二是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需要一个包括汇率和其他结构改革等的综合性措施。